

# 浙江籍 资本家的兴起

浙江人民出版社

# 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萧山印刷厂排版 浙江萧山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字数185,000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200

统一书号：11103·174

---

定 价： 1.25元

## 前 言

近年史学界十分重视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改变了过去偏重政治史研究的格局。我们这本以《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为书名的史料专辑，是从我们浙江省政协历年积存的和新近征集的经济史料稿中选编而成的。它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问题来。

浙江向来是个富庶的地方。海上“丝绸之路”据传就是以秦时的古鄞县（今宁波）为起点的；唐宋以后，浙江被称为“丝绸之府”，湖丝之盛，“衣被天下”；明州（今宁波）又早为海外贸易和造船业的中心。到了明初，最先在浙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至清乾嘉之际，手工工场已颇具规模，湖州有织机四千部，杭州有三千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辑里丝”驰名海外，生丝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而浙江就是它的主要产地；由于积累了长期的贸易经验，浙江多善于经商的人，如宁波，有“无宁不成市”之谚；除了本省的港口之外，中国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就在浙江的大门口。这样，近代的浙江帮商人，以浙江为基地，以上海为中心，展开了活动，后与江苏帮被合称为“江浙资产阶级”（或称之为“江浙财团”，未必恰当）。他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代袭了中国资产阶级所走过的道路。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诚然，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又对抗又依赖的两重性，）但是过去有些史学家往往对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看得不足，而较多着眼于他们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所以，对于他们的活动应怎样作出恰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

价，是关注近代史研究的同志们所感兴趣的。我们在这里，仅仅就这本史料专辑所触及的某些问题，提出来就教于高明。

### 一、第一代资本家的功过

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第一代资本家不少是从封建官僚、特别是从洋务派官僚转化而来的。

如胡光墉，即胡雪岩，便是左宗棠的幕僚。除了胡庆餘堂国药号至今尚为人称许外，他的名声一向不怎么好。诚然，他帮助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但是他也帮助左宗棠办过洋务，左创办福州船政局，即胡所献议，左以船政局的“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一手经理”。左在开发大西北时办甘肃织呢局、开河渠、开矿产的机器设备，也是胡所购运。当左宗棠力排投降派的阻难，进军新疆，消灭入侵的阿古柏部，粉碎英俄瓜分新疆的阴谋，迫使俄人退出伊犁时，胡光墉更出了力。他为左部购买了新式武器，左宗棠说：“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光绪四年三月左宗棠奏稿《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胡替左所借洋款共六笔，其中百分之八十八是用于收复新疆的。当时对借洋款事，虽人言啧啧，但曾国荃说了公道话：“虽其所费较多，而其所全者甚大！”（光绪十年《署两江总督曾国荃咨复户部文》）还有，胡光墉积资二三十万两，所开阜康钱庄、银号，遍于南北；他与湖州大丝商、南浔“四象”之一庞云鏊合做生丝出口生意，一八八三年，他敢于以巨款购回生丝，与垄断丝市的上海外商较量，终于在外商的压迫倾轧下，遭大亏损；清政府又乘其危，投井下石，以致破产，一夜之间，各地阜康全都倒闭。（本书：黄萍荪《“红顶商人”胡光墉兴衰史》）他就是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夹击下倒下去的。

又如严信厚，字筱舫，慈溪人，是李鸿章的幕僚。他是由胡光墉介绍入李鸿章幕的，他也和胡光墉一样，当李镇压捻军时，任驻沪襄办转运饷械（胡也任左宗棠的上海采运局务），后来他又

任督销长芦盐务河南官运事，搜刮了不少的钱。但是，他以积累的巨资，于一八八六年在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十年之后，发展成为通久源纱厂，为浙江最早的民族工业“三通”之一；另外还办了通久远面粉厂等。他还是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一九〇二年创设的上海商务公议所的所长。

由比可见，对第一代资本家应给予恰当的评价。

## 二、丝绸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的发展

近代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是生丝贸易，最早的民族工业是缫丝工业，这两者都是浙江人带了头。太平天国以后的一八七〇年，以辑里湖丝为主的生丝出口，值二千余万关两，占当时中国全部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仅湖州南浔一镇就有经营生丝出口致富的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家族群，积资五百万以上的就有刘贯经、张竹斋、庞云辂、顾福昌等家族。诚然，外国资本借他们之手掠夺了农村，但他们也受外国资本的压迫，如“四象”之一的庞云辂因和胡光墉合做丝生意而致亏损，临死时还告诫子孙：

“白老虎可怕！”（本书：林黎元《四象八牛——南浔丝商十二家族》）怕的就是垄断丝市的外商的压迫。而他们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多数都转化为工业资本。如庞云辂的儿子庞元济，没有向“白老虎”低头，投资创办了设于杭州的世经丝厂和设于塘栖的大纶丝厂，世经与萧山的合义和、绍兴的开永源合称“三丝”，为浙江最早的一批民族工业；他还创办了通益公纱厂（“三通”之一），办了造纸厂。“八牛”之一周家的周湘龄，也办了杭州天章丝厂和湖州模范丝厂。另有多家投资于铁路、银行，等等。（本书：林黎元《四象八牛——南浔丝商十二家族》）所以，如果没有经营生丝出口积累的商业资本，也就不可能转化出一批成为骨干的民族工业。其实，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从丝绸商业到丝绸工业及其他工业的发展的过程。继“三丝”之后，又有蒋广昌、王悦昌等绸庄，也以商业起家，后即设厂织绸，成为巨富。辛亥革命

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丝绸为主的民族工业又有新的发展，如朱谋先、许炳堃所办的纬成丝绸公司，开始资本只二万元，至一九二二年猛增至二百四十万元，所产厂丝出口额超过上海各丝厂而居第一位。（本书：求良儒《近代浙江丝绸业民族资本的发生与发展》）

另一位湖州人黄佐卿，原也是个生丝出口商人，早在一八八一年就在上海创办了公和永缫丝厂，是第一个在上海办丝厂的中国人，为民族工业的先驱人物。但他后来在一八九五年办了裕晋纱厂，因受盛宣怀控制的华盛纺织总局对其他私营纱厂的压制，不得不向外资银行借款，原想勉渡难关，哪知是饮鸩止渴，因透支过大，被强行拍卖，黄亦含恨而殁。（本书：李惠民《第一个在沪办丝厂的民族资本家黄佐卿》）这都可见这一代人求生存和发展之艰辛。

### 三、从钱庄到银行

浙江商人经营钱业有百年历史。浙江帮钱庄的资本在上海要占钱业总资本额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自从上海开埠后，外商银行涌入，旧式钱庄自然非其敌手，但由于外商银行在内地没有分支机构，洋行要向内地推销洋货、收购土产，反要借重于实行汇划的钱庄。一八六九年，外商银行为了利用钱庄，还允许钱庄庄票可向它们调头寸。过去人们据此便说钱庄是“买办化”了。其实这话并不尽然。因为：浙江帮钱庄在上海之所以能稳步发展，除了有外国资本的扶植之外，主要是由于有在上海的广大浙江帮工商各业为其依托，因而一向被称为“百业之首”。上海的浙江帮工商业实力雄厚，平时钱庄以资金支援各业，有急难时各业也支援钱庄，例如在金融风潮中，当外商银行拒收庄票，或反对汇划时，各业一致帮助钱庄，使外商银行就范。而且浙江帮钱庄的投资者，均为巨富，如叶澄衷、朱志尧等，都同时投资工业，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互相挹注。（本书：陆康《浙江籍金融家在上海》）特别是钱庄还积极支援民族工业，如长期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的

秦润卿，即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其业务宗旨，一九二七年，他任经理的福源钱庄就对六家纱厂承借抵押放款共达九十六万元。一九三三年，鸿章纱厂向福源钱庄借款二百三十七万元，超过福源原有资本额的四倍。（本书：周采泉《我所知道的秦润卿》）所以它们应是民族资本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情况，浙江帮的钱庄并不甘心于当外商银行附庸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人要自己办银行。尽管这是外商银行所不愿见，往往加以歧视和刁难的，但钱庄业还是积极地 toward 银行转化或渗透。如一八九七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严信厚就自愿以他所设钱庄、银号为基础组建，后来以商股形式加入进去。又如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时，最主要的分行——上海分行一直由浙江帮钱庄金融家胡睦卿任掌实权的首席副理。在筹划交通银行在上海复业时，也是由原任浙江帮钱庄经理的李寿山主持之。浙江实业银行的前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总经理何敬安，也是钱业巨子。四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则为宁波帮钱庄所组建。）（本书：陆康《浙江帮金融家在上海》）可以说，浙江帮掌权的各银行（中、交、南三行及四明等银行），是由两部分人所组成，一部分即钱庄出身的，一部分是外国留学回来的。当时这些银行商股占绝大比例，有的全是商股，应都是民族金融资本。

#### 四、铁路和民族资产阶级

铁路曾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焦点。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由民族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沪杭甬铁路的保路运动是最早发动、最有成效的斗争之一，它鼓舞和带动了全国的斗争。而在这运动中，汤寿潜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汤寿潜本人虽非资本家，但一般都以他与张謇并提而作为江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八九〇年他就发表了《危言》一书，这书比郑观应的《盛世危

言》还早。他是浙江最早倡言变法的维新思想家。他在这本书里就为争取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而呼号。一九〇七年，汤寿潜鉴于英美谋我浙江铁路建筑权日亟，发起商民自办铁路，被举为浙江铁路公司总理。他为了抗拒英国铁路借款，发动广大人民认股集资，得二千三百万元之巨数，超过清政府被迫接受的英借款数两倍。连挑夫、饼师都踊跃认股。汤感动地说：“人心如此，浙或不亡！潜惟死争以报。”（《江浙铁路风潮录》清末石印本）清政府为了想搬开这块阻碍其出卖路权的大石头，两次要把他调虎离山，都未得逞。他愈斗愈勇，一九一〇年上书清政府，直斥主持卖路的盛宣怀为“罪魁祸首”，“轮电矿政，国无寸效”，“损中益外，假公肥私”；甚至以死相拚，说清政府“若以罪魁祸首为是”，请求“愚寿潜之首于藁街”。被激怒了的清政府悍然将他“革职”。但是浙江铁路公司“全体董事”发电全力支持汤寿潜，说“路由商办，总理由商举”，朝廷无权将汤革职。（《国风报》第一年第二十期，宣统二年七月廿一日）最后，浙江的保路斗争终于取得了局部胜利。这样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后，汤寿潜之被举为第一任浙江都督，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事，有些史学家说他“抢先”“攫取”云云，似乎有欠公允。

还有个事实，前面提到的丝绸业资本家大都是这次保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四象八牛”家族中的刘锦藻是浙江铁路公司的副理，庞元济、邢麐星、周湘舲以及蒋广昌主人蒋海筹、蒋抑卮等，都是大股东或董事。丝绸业投资占浙路股本的十分之七、八。（本书：求良儒《近代浙江丝绸业民族资本的发生与发展》）为了建铁路、保路权，一九〇七年还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商办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它就是专为收储和运用铁路资金而设的，开始时由蒋海筹父子掌实权。可见浙江民族资本家对于这一关系国家命脉的铁路事业是全力以赴的。

## 五、买办和民族资本家

鸦片战争后，英侵略者培植了第一代买办，其中很多是浙江人，如穆炳元、杨坊、吴煦、王槐山等，他们为虎作伥，损害了民族利益，但是，对出身买办的有些人还是应作具体分析。例如宁波人刘鸿生，是英商开平（后称开滦）矿务局的买办，但他把做买办和商人时所进行的资本积累，向民族工业转化，成为一个拥有火柴、水泥、毛纺、煤矿等民族工业的资本家，并以他所办的火柴厂为基础，组成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以国产火柴抵住了日本、瑞典火柴的倾销，保护了民族利益，他无疑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又如虞洽卿，从一八九三年起当过德商鲁麟洋行、俄华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的买办二十多年，但从一九〇九年后，他即逐步把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他集资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就与英商太古、法商东方等轮船公司作了艰苦的斗争；继又在家乡所办轮船事业的基础上，独资兴办了三北轮埠公司，后又一再增资，还盘下了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办起了三北机器造船厂等。到抗战前，他投资航运业的资本已达四百五十万元。一九三五年，虞洽卿共拥有大小船只六十五条，计九万吨，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百分之十三。<sup>①</sup>（丁日初、杜恂诚《虞洽卿简论》）这些事实，都应在近代史上实事求是地书上一笔。

#### 六、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的浙籍资本家

辛亥革命时，以“四象八牛”家族为例，张静江、张弁群、庞青城、周柏年等，都赞助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加入了同盟会。中部同盟会陈其美等发动沪浙苏起义时，也得到江浙资产阶级朱葆三、王一亭、李平书、虞洽卿等的财政的资助和“商团”的支援。

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中，浙籍资本家占多数的上海总商会，也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参加了斗争。

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当北伐军节节胜利，直扑上海，而上海工人发动三次起义时，浙籍资本家与早萌叛志的蒋介石互为依靠。拿出钱来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就于四月十二日悍然发动了反革命

事变。这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在人民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没有过多久，他们便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步步控制，四大家族以公债抵充官股或杀价收购商股等办法把中国、交通、南三行以及四明等浙籍金融家掌权的银行控制起来，连蒋介石的“乡亲”、“恩人”虞洽卿也未能例外。

（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浙籍资本家投入了反日运动。如虞洽卿，出任上海反日后援会主席，发动抵制日货，他对蒋说：“非归还东北，不停止抵货！”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占上海后，他多次抗拒威胁利诱，不当汉奸；一九四一年到了后方，他又组织三北运输公司，在滇缅、川滇路上抢运战时物资。（本书：孙筹成等《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虞洽卿事略》）又如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陈朵如，抗战前，支持该行襄理、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从事救国会的活动，抗战时，坚持在上海，置日伪的引诱恫吓于不顾，不受利用，不任伪职。（本书：沈鸣山《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陈朵如》）这都是爱国的表现。

浙江籍资本家的种种表现，可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缩影。）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这本史料专辑所要提出的问题。我们所选史料很不够，所提问题也未必恰当，甚至可能有不少错误，尚希读者不吝赐教。

在选编本书时，蒙上海社会科学院丁日初研究员和杜恂诚、沈祖炜同志以及名记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组徐盈同志的指导，丁日初同志两次来杭看稿，提出不少修改补充意见，给我们很大帮助，我们谨向他们致谢。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何 其、梁则圣、王遂今、求良儒  
本书责任编辑：王遂今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 目 录

|                    |                  |
|--------------------|------------------|
| 前言                 | 编 者 ( 1 )        |
| “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兴衰史   | 黄萍荪等 ( 1 )       |
| “四象八牛”——南浔丝商十二家族   | 林黎元 ( 29 )       |
| 第一个在沪创办丝厂的民族资本家黄佐卿 | 李惠民 ( 57 )       |
| 近代浙江丝绸业民族资本的发生与发展  | 求良儒 ( 62 )       |
| 汤寿潜和浙江铁路           | 王遂今 ( 87 )       |
| 虞洽卿事略              | 孙筹成 黄振世等 ( 104 ) |
| 虞洽卿在家乡所办的事业        | 戴余方 ( 129 )      |
| 虞洽卿其人其事            | 周采泉 施叔范等 ( 132 ) |
| 记宋汉章自叙生平二三事        | 朱冶青 ( 144 )      |
| 关于宋汉章              | 余姚县政协文史组 ( 148 ) |
| 李馥荪与浙江实业银行         | 秦天孙 ( 152 )      |
| 记金融家李馥荪            | 王季深 ( 163 )      |
| 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陈朵如       | 沈鸣山 ( 173 )      |
| 交通银行实权人物——钱新之      | 张平夫 ( 179 )      |
| 我所知道的秦润卿           | 周采泉 ( 184 )      |
| 浙江帮金融家在上海          | 陆 康 ( 193 )      |

## “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兴衰史

黄萍荪 原作 王遂今 补充

一般人都知道杭州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胡庆馀堂国药号。它的创办人叫胡雪岩，就是胡光墉（一八二三——一八八五年）。他是个大商人，积资二、三千万两。他开了许多钱庄、银号、当铺，胡庆馀堂只不过是其所开的店铺中的一家。他也做官，官做得不小，是左宗棠手下的红人，帮左宗棠镇压太平军，但是在左宗棠出兵西征收复新疆时，他有很大的劳绩。左宗棠赞他为“商贾中奇男子”，“有豪侠之概”。经左宗棠的保举，他被赏给头品顶戴，皇帝还赏给他穿黄马褂，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荣耀。但他并不放弃经商，他由商而官，亦官亦商。他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官商”。

### 胡光墉是怎样发迹的

胡光墉，原籍安徽绩溪，寄籍浙江杭州。家本贫穷，无钱延师就塾，靠自学，粗通文墨而已。经亲戚荐为杭州的一家阜康钱庄当学徒。三年满师，升为钱庄跑街。这个时候，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冲击着清朝的腐朽统治，在杭州城里，候补、捐班的官吏多得，他们花了钱捐了官，等待着发放出去当个知县、知府或道员，以便搜刮更多的钱。但他们在候补期间，有的已两手空空，只得仰给于钱庄；就是放了官，打点上任时也需要向钱庄先借一笔。胡光墉这个钱庄跑街，主要就是跑这些候补老爷的放贷生意

的。

胡光墉以一个钱庄跑街，怎么会发迹致富而成为“活财神”的？有种种传说，有的还夹杂些迷信神话色彩。比较流行的说法，见于陈代卿（字云笙，四川人，同光年间曾官于山东）的《慎节斋文存》。大意是说：

一天，钱庄跑街胡光墉，碰到一个后生，也是个候补的，见他生相不凡，但穷酸潦倒。胡问道：“看你不象没出息的，为啥这般落拓？”那后生原来便是后来当上浙江巡抚的王有龄，这时因他父亲死了，流落杭州，贫不能归。他把处境跟胡讲了，胡就邀他到茶店里聚谈。胡表示愿意助一臂之力，送他进京去图个官职。胡说：“我刚好为钱庄东家收有一笔五百两银子的款子，就借给你罢，你赶快动身。”王有龄哪里肯受？说：“这不是你的钱，东家能不追问吗？”胡说道：“你放心拿去好了。我反正没有家，只一条命，就是东家索去也无益，但望你得意后别忘了我。”王只得拿了银子动身北上，到天津，碰到了故交何桂清侍郎。何劝他不必进京，还是回浙江去好，并介绍他去谒浙江巡抚某公。王就拿了介绍信回到浙江，谒见巡抚，巡抚委他任粮台总办。王有龄得了官职，立刻出去找到胡光墉，并把以前所借五百两银子加上利息还了他，向他千谢万谢。后来就叫胡光墉辞去了原来的东家，支持他开起钱庄来，这便叫阜康钱庄。不数年间，王官越做越大，终于当上了浙江巡抚。这时，王又保荐胡接管粮台，从此胡得以大发舒，钱庄与粮台互相挹注。胡又会做生意，开起了好多的店铺，并与外商做生意，进出常以千万计，成为富甲杭城的大商人。

这段记载，关于王有龄“落拓”之说，未必可信。据考王有龄于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就来浙江，历任新昌、慈溪、仁和县知县，父死，回闽守丧，旋回浙，署湖州府，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任杭州知府，可谓一帆风顺，未必有告贷于胡的

事。

据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则说告贷于胡光墉的是湘军一个营官，他向胡借二千两，这时钱庄老板不在，胡自作主张借给了他。等老板回来，大怒，把胡赶出店门。不久，营官拿钱来还，问：“以前借钱给我的少年怎么不在？”老板只得骗他说：“病了。”营官在路上碰到了胡光墉，见他穷无所归，蹣跚而行，大惊，问：“为什么弄得这样狼狈？”胡告诉他：“已失业好久了，原因就是为借钱给你被赶了出来。”那营官大受感动，说，“这是我把你害苦了。”马上请到军营里去，供以鲜衣美食，因这时这营官已暴得十万之资，便交给胡光墉去开钱店，又辗转引荐给浙抚王有龄。又据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能录自前书，只是加上一些情节，如说营官的十万巨资，“皆得自‘贼’（指太平军）中者，固不足告外人”，这与前书的“暴得”是一致的。此说似乎比王有龄落拓告贷之说更接近实际一些。不过，胡光墉之发迹，的确还是在受知于王有龄之后，从此他才有了官府做靠山。

与前两说不同的，尚有胡光墉的直嫡曾孙胡亚光的《安定遗闻》，据说胡光墉“少式微，不暇攻诗书，学贾于阜康钱肆，肆主于姓，无子，爱公勤敏有胆略，颇器重之。疾革时，……即以全肆赠之，数不逾千金。”这里没有提到前面各说中的那段传奇故事，可能是为亲者讳。

此外，与胡光墉同时代并有往来的段光清（曾任浙江布政使，太平军克杭，他因逃跑被革职），在其《镜湖自撰年谱》咸丰十年（一八六〇）一条中说：“有起于钱铺小信姓胡，名墉，字雪岩者，骗人资本，此时已自开钱店，与官场人往来。后则显要，当道皆重用其人。”至于怎样“骗人资本”，未具体说。

以上各说虽互有歧异，但大致可见胡光墉其人机敏，善于投机取巧，作风泼辣，使人觉得他慷慨好义，能济人急难，从而赢

得了人们对他的信托和报答。王有龄之倾心倚重，即使未必有所传之奇事，当亦得过胡的某些好处；于姓店主之以全店相赠，也必有使他觉得胡足以付托之某些表现。段光清说他“骗人”，可能就是指胡的这种手段。

胡光墉之结识王有龄，当在一八四八年王有龄署仁和县之前。王的步步高升，使胡及其阜康带来好处。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两江总督何桂清奏调王有龄为江苏按察使，继迁布政使。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太平军第一次围攻杭州，王有龄带兵由江苏驰援。太平军因分散围困天京之敌兵力的目的已达，即主动撤离浙境，王有龄现成当了浙江巡抚，踌躇满志。胡光墉也水涨船高，成为抚署签约房上宾，王以省库委诸光墉，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见刘声木《异辞录》）王又命胡赴沪甬采办粮食军械。这时王趾高气扬，但胡的眼光比王尤高出一筹。他看出太平军的一时转移，正是为集中兵力卷土重来之张本，所以早将阜康资金潜移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了。果然，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李秀成率太平军再度攻克杭州，王有龄走投无路，自缢而死。

## 胡光墉是怎样得到左宗棠信任的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太平军再克杭州、王有龄兵败自杀之日，胡光墉正押着货船，联帆二十余艘，自上海满载军粮军需，驶入钱塘江来。及他得知杭州已为太平军所有，就不在三郎庙拢岸，立刻装扮成商船模样，分散开来，逆流负纤，溯江而上。这时太平军已连克富、桐、严、金、衢，但因水师不足，江面未全控制，使胡光墉有隙可乘。

胡光墉要到哪里去呢？他的粮船究竟落在谁手呢？

原来这时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湘军四万，已从江西广

信、安徽婺源进入浙境。胡光墉乃溯江直趋左军，至广信谒左宗棠。左宗棠于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正月就任命胡办理粮台和转运局务。而这时距太平军克杭仅及一个月，胡光墉就突然出现于广信，其行动可谓快捷了。这可以左宗棠于这月二十九日写的奏稿《官军入浙应设粮台转运接济片》为证：“臣军业已入浙，所有饷需一切，自应设粮台转运，以资接济。……现拟暂于江西广信府设立粮台，为收支军饷子药总汇，再于玉山设立转运局，随时转运，以利师行。……闻籍贯浙江之江西候补道胡光墉，急公慕义，勤于有为，现已行抵江西，堪以委办台局各务。……以浙江之绅办浙江之事，情形既熟，呼应较灵。”

然则胡光墉的粮船有没有运到左军手中？虽然有胡的粮船在杭州三郎庙“为太平军截留”之说，但别的一些记载未言被截留事。据《杭州府志》载，胡船入钱塘江，因杭城被围，不得通，将正运之粮匿置僻处，后以献于左之湘军。此说比较可信。如果没有一点粮食献到左军手里，左宗棠怎能会一见面就赞他“急公慕义，勤于有为”呢？

《慎节斋文存》还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可以说明胡光墉是怎么取得左宗棠的信任而被重用的：“胡以前抚（指王有龄）信任，为忌者所谮，左公闻之而未察，姑试以事：命筹米十万石，限十日，勿违军令。胡曰：‘大军待饷，奈枵腹何？’左公曰：‘能更早乎？’胡曰：‘此事筹已久，待公言已无及矣！现虽无款，某熟诸米商，公如亟需，十万石三日可至。’（果如其言），左公大喜，知其能，令总办粮台如故，而益加委任。”三天内办十万石米，变戏法也变不出，大概就是前所运至而隐匿僻处的。胡声木《异辞录》也有类似的记载，但说这批粮食是先变卖，后再购回，而献于左军的。

胡光墉运用他亦官亦商的地位，经常来往于上海、宁波，与洋人打交道。从左宗棠军入浙到攻陷杭州城的两年时间中，胡除了